

人文研究集刊

創刊號

中國人文研究學會
1989

香港經濟現代化的啓示

王于漸*

現代化經濟的特色

本文以香港作為個案來探討經濟現代化的問題。在開始探討之前，首先要對經濟現代化的目的和現代化的經濟特色下一個定義，提出一些看法。經濟現代化的主要特徵是能夠保持持續的經濟成長，與此同時，還應有以下的特點：首先，經濟發展的水平，即使未能達到富裕的程度，也能擺脫普遍貧窮的處境。第二，經濟發展的自我延續（self-sustaining）能力趨向成熟，外來經濟因素不足以令經濟發展停止。第三，整個經濟必須有多元化的結構，而非限於少數幾方面的經濟活動。以上三點特色一定有的相互關係。複雜的經濟分工是自我延續能力的基本條件。各行業愈齊備，創新的成本愈減少，企業家易於把握不斷出現的新機會，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對外來影響的承擔能力比較大。早在二百多年前，亞當·史密已提出：經濟分工是帶動技術改進，促進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今天我們所說的現代化與當年亞當·史密所提出的論點是一致的。

上述有關經濟現代化的特色，說明為甚麼部分在中東的產油國，如科威特，雖然經濟上相當富裕，卻不能算是現代化的國家。一個單靠石油出口致富的國家，其經濟自我延續能力是沒有保證的。李嘉圖當年斷言：地主階級最終會沒落，因為他們財富的來源只是土地〔指自然資源〕。同樣，這個斷言也可應用於不少中東的產油國身上；那些單靠自然資源致富的國家，除非能發展更多元化的經濟體系，否則長遠來說，其經濟前景是不樂觀的。同樣地，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一些新興工業國，如南朝鮮，雖未成為富裕的國家，祇是衝破了貧困的局面，但由於經濟擁有相當複雜的分工，其自我延續能

*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

力，反而取得一定的保證，所以可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按照這些標準，在世界上可稱得上是現代化的國家仍然為數不多。

經濟現代化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這個觀點在二百多年前由亞當·史密首先提出，在當時，他的觀念是非常革命性的。他嚴厲地批評那種只重國家富強而不顧人民生活的重商主義經濟思想。今天，當我們在討論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前提下，除了追求經濟成長這一目標外，也追求經濟平等，務求經濟成長的好處由大多數人分享，避免出現貧富懸殊的情況。

不少經濟學家將經濟進展過程分為許多不同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發展，第二階段是工業興起，第三階段是服務業擴張。有些學者甚至進一步將第一、第二及第三階段細分，經濟發展被分成許多大大小小的階段。學者們對這些發展階段論一直有爭辯，在世界各個現代化國家中，我們多少可以看到這些階段，但也有不符合以上發展規律的例子。將經濟發展分為不同階段，主要是達到敘述與形容事實的作用，而不是解釋事實。假如深入去分析及觀察各地經濟的實況與發展，就會發覺分工才是最基本的共通點。新行業的興起，舊行業被淘汰，都在分工的過程中發生；至於那些行業會興起或被淘汰，或許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偶然因素的作用。以香港來說，它早期是一轉口港，服務性行業是主要的經濟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業興起，但到了七十年代末期，由於中國開放經濟，轉口港地位又再恢復。要理解香港的發展路途，許多外在的偶然因素顯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香港的經濟絕不能簡單地歸入任何經濟發展階段的理論模式來解釋。總括而言，要從理論的層次去解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而非限於描述的層次，就必須掌握經濟分工這個概念，而非徘徊在發展階段的劃分。前者具有普遍性，後者則受制於時空。

按照上述標準，毫無疑問，香港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由於香港經濟是出口所帶動，經常受外界經濟環境所影響，或者會令人懷疑究竟香港的經濟是否有自我延續的能力。作為一經濟城市，香港是不能自給自足的，經濟上受到外界影響乃不可避免，但這樣未必減少其自我延續能力，因為香港的經濟分工已頗為複雜，可分散承受外來的影響力。此外，香港亦影響外地的經濟。據報導，香港的廠家在國內設廠所僱用的勞動人口以百萬計。而美國東北部在 Appalachian Mountains 一帶的貧瘠山區，其居民大部分是依靠上山採摘人參為生，當地的人參主要輸往香港。在國際間最龐大的空運速遞公司（DHL International Ltd.）是由一名香港商人在香港所創辦的，其對國際信息的傳遞起着很大的作用。其它相類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由此可見，一個現代化經濟的特色就是令人無法分辨出在經濟關係上是處於主導還是從屬者，複雜的分工已使經濟關係縱橫交錯，因與果已無法簡單地歸類。

戰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可謂世界上少數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有人以為，探討香港成功的原因可作為未來發展的指引，甚至可提供給別的國家參考。究竟香港的發展經驗是否可被移植到外國？同時，可否作為本地未來發展的參考？這點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大家知道，每一項具體因素或發展經驗都不是可以輕易地被移植的。原則上，具體的經驗根本不可移植，因為這一切都受着時代環境和許多外在因素所影響，而我們無法將所有的背景因素重新創造出來。可以移植的祇是一些基於具體經驗，經過理論的分析，在抽象的層次總括出來的啓示。有關經濟發展的理論也非常多，每一個研究員或許也有他自己的理論，而究竟甚麼才算是理論，也沒有一致的看法。本文將經濟理論界定為有普遍性的科學知識，是社會科學所追求的目標，是源於事實但高於事實，在抽象層次上的解釋。

在未開始分析香港經濟現代化的經濟之前，首先簡單地總括一下香港的發展過程：香港是中國海岸綫上最好的深水港，鄰近中國近代對外開放的主要城市——廣州。在十九世紀中葉割讓給英國後，香港成為英帝國在遠東的重要商業港口。這幾點巧合的因素使一個平凡的漁港迅速地演變成爲一個重要的轉口貿易港，商業活動迅速地增長。四十年代後期大量勞動人口由內地移居香港，有不少上海資本家亦雲集於此，又適逢國際貿易進入擴張的年代。韓戰爆發，世界各國對中國實施經濟禁運，基於多方面的因素配合，加速了香港出口製造業的發展。及後，紡織業、製衣業、電子業和塑膠業先後蓬勃發展。七十年代後期，國際金融業出現了重大革新，亞太經濟發展蓬勃，促使香港成為金融中心。此外，中國內地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重新推動了本港的轉口貿易。進入八十年代，香港在世界上扮演金融、貿易的中間人角色日益重要。這段歷史說明了香港經濟的發展是由許多偶然與巧合的因素影響下衍生出來，每一項因素的出現也許有其必然性，但不見得是爲了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目標而產生，而每一次變化亦不是預知或計劃出來的。難道整個香港經濟發展祇是一次美麗的巧合？若我們仔細分析這段歷史，能總結出甚麼經濟規律呢？香港在每一個轉變中都能充份利用自己的優勢，發展新的經濟活動，推動了經濟的分工與成長，在整個過程中又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比較優勢。而對每一項未可預見的轉變，香港都迅速的作出調整。整個過程並非任何整體發展計劃的落實，而是每一個人選擇與努力的結果。

以上的觀察雖然是比較一般和總結性的，但應是立足於對每項經濟活動，進行細緻的分析後取得。在這裏祇提出兩個事例：第一，由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五年間，香港的製造業從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8.1%下降至23.5%，該部門的就業人數佔全港就業人數比例亦由47.0%下降至36.8%，這是非常急劇的結構性轉變。但最令人驚異的是，它並未帶來失業問題，香港經濟能

繼續保持高速成長。在一九七五年石油危機後，香港經濟迅速恢復成長，其速度之快也是少見的。

第二個例子是香港勞動人口的就業結構的變化。按照歷年人口普查的資料，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七一年婦女勞動人口中從事外發工作分別為1.05%、1.09%和0.34%，所佔的百分比可謂相當低。但到了一九七六年，這數字就急劇上升至7.44%，一九八一年稍為回落至5.05%。要明白這個現象，就要首先了解香港的人口結構從一九六一年至八一年間起了甚麼變化。

戰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新移民多數是比較年輕的人士，他們的子女在六十年代剛好踏入勞工市場。在六一年至六六年間，十五至十九歲的女性人口增加了14.9%，在六六年至七一年間，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女性增加了73.6%。六十年代的年青女工踏入七十年代便開始進入適婚年齡，跟着就是養育子女的開始。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婦女人口在七一年至八一年間，在全部人口的比例中，相對地下降。女性的勞動力主要來自已婚婦女。由於有些婦女要兼顧家庭工作，所以比較不願意全日投入勞動市場，而且往來家庭與工廠的時間成本亦相對增加，香港的勞動市場被迫立即作出反應，有不少工廠大量僱用已婚婦女作為外發工，以解決勞工短缺問題。由於外發工與一般工廠工人的僱用條件和管理不同，所以，在七十年代間，外發工的增長，在微觀角度來看，反映了企業形態有不少變化；從宏觀角度分析，則說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改變了不同勞動僱用形式的相對成本，勞工市場不得不作出調整，外發工人數的上升不失為一項創新的發展。進入八十年代，由於大部份已婚婦女已完成養育子女的工作，因此更多的婦女再度投入勞工市場，減輕了婦女勞工短缺的情況，外發工人數也相對下降。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到香港在應付各種不同的新問題時都能作出靈活與適當的反應，根據本身的條件，按照比較優勢的原理去適應環境，克服困難，維持經濟持續成長。

利用市場的機制，單憑私人選擇與私人行動是否能達到資源最優分配的效果呢？經濟學的理论使我們認識到市場的運作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第一是有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使私有制受到保障；第二是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市場中的公平競爭，而政府本身不應插手經濟活動，以免形成不公平的競爭；第三是對於有嚴重外界影響的經濟活動應予以適當的鼓勵或抑制；第四是政府提供必須的公共財貨（public goods）以補充此類財貨在市場供應之不足。上述的第一、二點有關法治私有制與公平競爭，從性質上來看應算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貨。政府的工作如果能不超越以上服務範圍的話，市民就可以比較自由地按照本身的比較優勢，作出選擇，改善自己的生活。市場並不是萬能的，祇是在具備以上四個條件時，市場機制能充份地發揮作用，是

促進經濟富裕的最佳保證。綜觀古今中外經濟發展的成敗得失，主要取決於政府政策是否經常不適當地干預市場運作，使物不得盡其用，人不得盡其材，使資源調配錯誤，造成各種浪費，使人民生活無法改善。以香港為例，廖柏偉和本人在最近完成有關香港公共房屋決策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公屋計劃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5%，實在令人震驚。鄰近香港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在經濟發展上比香港落後很多，眾所周知。澳門經濟主要命脈在於賭博業的收入，澳門賭業比其它賭城的競爭程度較低，賭業發展受到政府約制，因而為澳門所創造的財富亦未能充份發揮。由於澳門主要的經濟活動，缺乏競爭性，整個澳門經濟的效率如何會高呢？將香港和澳門比較，不難發現港府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比澳門政府要少，所以對經濟不良的影響也較少。

無可置疑，有不少經濟發展迅速的國家，其政府對市場干預的程度也相當廣泛。因此要問：究竟香港政府的少干預政策與經濟高速成長的經驗是否有普遍性的連帶意義呢？本文篇幅有限，不能深入探討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對於如何促進經濟繁榮，存在着兩個不同看法。其中一種看法強調個人自發的積極性，另一種則強調國家的全面規劃與控制。戰後大多數經濟學家在凱恩斯與 Myrdal（1957，1968）的思想推動下十分強調由國家全面規劃和控制經濟活動，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在這種思想的策動下，公共部門不斷擴充，市場運作受到廣泛的干預，進口替代與外匯管制政策取代了自由貿易的制度。只有少部分國家或地區，例如香港，仍然按照 Bauer 與 Yamey（1957）的構思，依賴私有制度及市場機制來策動經濟發展。由於這些國家或地區限制了公共部門的擴充和政府對市場干預的程度，故直接加速了私營經濟的發展。

戰後的經驗說明，採取後者的途徑能比較有效地促進經濟快速成長。Scully（1988）的研究，以115個採用市場機制的國家與地區，於1960-80年期間，用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資料，進行分析。他發現在政治上比較開放的社會，由於奉行法治、尊重私有制並依賴市場機制調配資源，使之與其它地區相比，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成長率高了三倍！而經濟效率亦高出2.5倍。由此可見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對促進經濟成長起着極其重要的影響。

經濟學界有見於各國在戰後不同的經濟發展經驗，開始逐步擺脫了凱恩斯思想的影響，由鼓勵政府直接干預，糾正市場失靈，轉向要求約制政府，避免干預和破壞市場機制。近年有不少經濟學的研究，其重點就是要探討政府政策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一項比較具說服力的發現是 Daniel Landau 的研究結果：在九十六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中顯示，政府部門的支出愈大，

就顯著地對經濟成長產生負面的作用。按他的計算所得，每提高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一個百分比，就會導致每人平均國民生產值的成長率下降0.2%至0.3%。由於政府支出與政府干預市場的程度往往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故此 Landau 的發現表示香港的經濟發展與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濟是相類同的。

公共政策不是在真空中擬定的。主要的政策是不能與社會環境與條件脫節。影響政府政策的因素有很多方面。首先是領導人的意識形態。一般而言，不論在民主或專制的制度下，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上的主流思想應是有密切關係。然而，在香港這個華人社會中，自由經濟的思想對於大部份人而言是可以認同的。可是，統治香港的英國人，雖然有尊重自由經濟的良好傳統，但到了二十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已是日漸趨向加強政策管制方向的發展。所以，從意識形態的層面去分析，香港政府採用自由經濟政策是頗出人意表的。究竟政府每年所作出的經濟決策與應屆財政司的個人信仰有多少關係，我們就不得而知。假如真有關係的話，也只是巧合。

第二點值得探討的是：代表英國政府在香港負責統治的官員怎樣理解自己的統治目的和利益。英帝國主義者與其它帝國主義者最大的分別，在於其政府與商人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因此，香港自從由英人統治以來，政府並未真正和英商分享其統治權力。在十九世紀，英商會要求通過選舉的方法進入立法局，卻被港督拒絕。歷任港督亦從未由商人擔任。早期的港督主要是軍人，近期則由外交官擔任。這種巧妙的安排，在早期是為保障英國政府的利益，到後期的主要作用是英商不能壟斷政治權力。這樣，保持香港市場開放及公平競爭是比較有利的。

第三點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的政治前途一直有不確定因素；因此，負責治理香港的官員比較不著重長遠的規劃，形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這反而減少推出各種擾民的措施和好大喜功的計劃。

第四點是，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城市，與世界各國發展了許多重要的經濟關係。國際市場的約束，限制了香港政府採取干預措施的有效性，間接鼓勵了政府採用少干預的方針。

除以上各點外，香港內部的社會與政治力量分佈，對於促成政府採取積極不干預經濟的方針，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戰後的香港是一個主要由新移民組成的社會，他們在香港並無根深蒂固的網絡關係，在短期內無法形成政治力量。對大部份新移民來說，香港只不過是踏腳石，因此他們既沒有亦無能力要求政府採取特別的措施以惠及他們。第二，由於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市民無法統一其效忠對象，對政治漠不關心。而香港最主要

的政治力量——左派與右派——的政策是：既不承認港英政府統治的合法性，亦不從實際行動上去打擊其統治地位，所以他們沒有向香港政府提出太多要求。另一方面，香港政府顯然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但由於香港的政治前途長期不明朗，而國共兩黨在香港的實質力量亦不容忽視，爲了避免出現表面化的政治衝突，香港政府的政治姿態與政治形式在缺乏民主制度的監督的情況下，依然保持自我約束性，使香港的市民享有不少自由。與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相比，香港所享有的經濟自由可能更多。戰後不少西方的民主國家，不單祇未能限制政府的權力，反而通過不少法例，限制市民的經濟自由。有些國家的經驗顯示，祇是民主的制度未必能保障市民的自由及經濟的繁榮。能夠限制政府權力的不斷擴張，影響經濟的運作，才是最主要的問題。由於香港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形成一獨特的權力分佈，即使在沒有明文憲法來保障市民自由的情況下，實際上仍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就好像有一個不明言的社會契約（implicit social contract）一樣。

香港的特殊社會政治背景和具體經驗是幾乎不可能移植往外地的，而香港未來會出現的變化，令以往的基本政治結構及權力分佈，不能完全保留下來。香港的歷史告訴我們，透過憲法來限制政府的活動對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的幫助。可是憲法是由人寫出來的，不容易擺脫各種狹隘的既得利益者的局限，要超越這些利益又談何容易呢？在世界各國的憲法或不明文契約中，其內容能夠超越這些狹隘利益者，實在不多。正因如此，世界上能成功地現代化的國家可謂寥寥可數。香港實在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例子。

最後，討論一下經濟平等的問題。任何經濟發展的過程，都不保證所有人都能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但必須認識到，在公平競爭下，領先者要不斷作出努力才能保持領先地位，只要稍爲鬆懈就會被後來者居上。在一個開放的制度下，公平競爭除了能提高經濟效率，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主要機制。各國的歷史與經驗說明，最嚴重、最醜惡的不平等現象往往不是由市場所造成，罪魁禍首是政府壓迫與歧視性的政策。有關這方面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例如，人所共知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比較鮮爲人知，但又影響着超過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的，就是在許多落後國家所實施的農業價格政策。這些政府爲了急於現代化，它們往往會壓低農產品價格，以保證城市居民可享用廉價糧食，指望透過這一措施來加速工業發展。但這種措施卻直接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令彼等生活條件日益困苦。在大部份國家中，農民是主要的人口，這些政策直接加劇了經濟不平等的現象。對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平等也是一種公共財貨，因此，我們不應忽略政府在促進經濟平等上可以扮演的角色，但政策必須是對頭的。

總括而言，本文的重點不外乎三點，第一，容許市民按照自己的比較優

勢自由地追尋其本身的利益，是促進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條件；第二，政府的責任只在於糾正嚴重的外界影響和提供公共財貨，後者包括維持法治、保障私有制、維護公平競賽及促進經濟平等。除此之外，政府再無必要干預個人選擇，以免破壞市場機制；第三，為確保政府履行其應有的責任，必須有一個明文憲法或不明文契約來約束國家的權力，防止其干預人民自由，影響經濟的運作。香港經濟能夠現代化，主要是由於一些巧合的因素和政府自我約束，恰好滿足了以上的三點條件。無可置疑，要滿足以上各種條件是困難的。從經驗所得，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若能基本上滿足上述條件，其經濟就會趨向繁榮。

參考文件：

1. Peter Bauer and Basil Yamey,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2. Daniel Landau,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196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January 1986, pp. 35-75.
3. Gunnar Myrdal, *Economic Theory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Duckworth, 1957.
4. —,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Penguin, 1968.
5. Gerald Scully,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3, June 1988.
6. Yue-chim Wong and Pak-wai Liu,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mong Public Housing Tenants in Hong Kong and Related Policy Issu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January 1988, pp.1-20.